

MAKESI ZHUYI
ZHEXUE YU
ZHONGGUO
XIANDAIHUA
YANJIU XILIE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与
中
国
现
代
化
研
究
系
列

历史·价值·人权

——重读马克思

LISHI
JIAZHI RENQUAN
CHONGDU MAKESI

徐俊忠
钟明华 著
韩安贵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历史·价值·人权

——重读马克思

徐俊忠
钟明华 著
韩安贵

敬请为书指正。

徐俊忠

2000.9.1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价值·人权：重读马克思/徐俊忠等著. —广州：广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

ISBN 7-5361-2429-5

I. 历… II. 徐…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0064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广州体育学院内 20 栋

邮编：510076 电话：87550735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5.5 印张 37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 册

23.00 元 (平装)

定价：33.00 元 (精装)

中山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策划：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
主持：叶汝贤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研究系列著作

总 序

1996年，国家教委和广东省批准中山大学“211工程”建设的立项。在中山大学九个获准立项重点建设的学科中，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年来，本学科点全体教师、工作人员，团结奋战，使本学科点在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条件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系列著作，就是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总题目。在这一总题目之内，包括三个子项目：由叶汝贤教授和冯平教授主持的“唯物史观前沿问题研究”；由刘嵘教授和章海山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发展哲学研究”；由郑永廷教授和李萍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人的现代化研究”。

上述三个子课题，是相互联系的。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哲学的探讨，是本学科点整个学科建设的重心，其他方面的建设，都是围绕这一重心展开的。唯物史观前沿问题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又是为了探讨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为了把探讨现代化建设的哲学基础，建立在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新成果之上。而人的现代化，则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课题与终极目标。显然，研究中国的现代

化，同样应该把研究人的现代化作为核心课题。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来自生活，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服务于生活。以改造世界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把关注和改变人类的命运、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就是要关注和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把中国的发展问题作为哲学探讨的中心和出发点。我们承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这一课题建设的任务，就是出于这一种使命感。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想，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4页。）我们这个时代，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种时代的内涵和特质，决定了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主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哲学应该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形式和主要内容。我们这套系列著作以从哲学上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为中心，同时也试图为建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形态的“发展哲学”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我们希望这套系列著作能够成为开启21世纪“发展哲学”研究的引玉之砖。

叶汝贤

导言：我们何以要提出重读马克思的课题

自从 20 世纪以来，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学说莫过于由十月革命的炮火传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马克思的名字几乎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相连相系。然而，在今天，马克思及其学说在中国的命运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批判市场为著称的马克思的思想不断地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冷漠、奚落和拒斥。人们也许还记忆犹新，在 1998 年，正当马克思那篇宣告资产阶级社会必然灭亡的《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之际，西方国家的许多组织有声有色地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包括一些重大的国际性纪念活动，而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对它的纪念，却是低调和冷清的；在 2000 年到来的前夕，资本主义世界的媒体传来了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的信息，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们对此的反应也是迟钝和平静的。这两件事的接连出现，留给人们许多思索的空间，但是马克思受到了冷漠对待的倾向，却是一个不难从中感觉到的事实。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条件下，对一种学说和理论具有不同的认同倾向，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问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向来是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的，冷漠、奚落和拒斥马克思思想的现象的发生，本身就蕴含着十分特殊的意味和奥妙。作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我们也在思索其中的因由和奥秘。然而，在对于问题进行思考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位伟人的一段认知性告诫，“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受启发于这一告诫，我们

认为，与其对于问题空发议论，夸夸其谈，不如从基础性的认知工作开始。于是，就有了“重读马克思”研究思路的提出。

提出“重读马克思”的研究思路，本身就蕴含着我们的两点基本判断：一是认为被阅读的文本本身是有价值的；二是认为被阅读的文本又是需要重读的。前者意味着我们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的体认，后者则包含着我们对于长期以来人们解读马克思思想的状况的反思。我们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是存在着片面解读的缺陷的。因此，“重读马克思”之所以是必要的，在于我们既需要借助“重读”去纠正以往对于马克思的思想的片面认识，也需要通过“重读”去重新认识和发现马克思的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来看，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是沿着阶级斗争的阅读视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阅读视界的形成有其复杂的背景。它既与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首先来自于以高度突出阶级斗争的意义为基本特点的俄国版本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处于残酷的阶级斗争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关。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借助这一阅读视界，曾经使马克思主义充分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但是，仅从这一视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却是片面的。它不仅不利于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把握，也造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严重挫折。实际上，时至今日，人们之所以出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冷漠心态，“信仰危机”的阴影也未能完全消除，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解读。由于片面的解读，特别是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如“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

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①以及他晚年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对于阶级斗争问题的不断强化，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印象，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因此，当改革开放一开始，当随着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所形成的极“左”路线的批判的深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受到质疑，党中央宣布“停止使用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时，就在人们的思想中掀起了激烈的冲突。有人指责这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有人亮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更多的人则是产生了迷惘和对于意识形态的反感与拒斥，并导致所谓的“信仰危机”和引发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我们认为，这种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消极认同倾向的出现以及由其引发的“信仰危机”，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危机，而是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解读方式所造成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在客观上看，有利于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理性和成熟，促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然而，如果人们固守原有的阅读视界，不能从阶级斗争这一阅读视界中调整过来，并借助新的阅读视界的形成，获得对于马克思的思想的新的理解，阐述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价值，我们就不仅无法真正地走出危机，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会窒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可见，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必要性，直接来自于克服长期以来由片面的阅读视界而导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缘起于迅速改变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的要求，又是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版，第1487页。

产物。实事求是地看，建国以来的一系列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政治运动的发生，有些确实是由当时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所导致的，但也有些却是根源于国家的物质的匮乏和文化的落后。以对于干部问题的处理为例。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反复告诫全党，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他真诚地把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作为其终生的政治期待，并不断地警示全党要防止干部腐化变质，政权改变颜色。因此，他对于出现于干部欺压民众、鱼肉百姓、耀武扬威以及其他的官僚主义现象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为解决这种问题，他不惜借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方式。历次以干部作为整治对象的政治运动，包括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实际上都是他借用政治运动的形式整治干部中出现的问题的典型案例。这里固然有思想方法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能超出阶级斗争的视界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实际上，上述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必须诉诸于消除物质匮乏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因为在物质匮乏成为普遍化的条件下，人们就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一切陈腐污浊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而在文化落后的条件下，人们包括干部获得利益的方式就会自然地带上愚昧的、粗陋的倾向。因此，改革开放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大举措，在中国的提出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它带来了社会的繁荣和富足，但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开始于经济领域，这种选择是依据于对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又是依据于中国的国情而作出的。但是，社会生活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经济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领域的

改革开放就必然要引起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变革，它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其他领域的变革来提供配套和支持。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但是它的效应却不仅仅在经济的领域。它在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成员的富足的同时，也拓展了人的交往范围，促进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改变，使中国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改革开放不论发生在经济的还是在非经济的领域，都意味着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和整合。尤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它力图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调动和激发社会成员的工作热情，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引进市场就意味着引进竞争，市场经济成分的不断加大同时也是社会竞争的普遍化发展。而竞争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利益的日益分立和多元，也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日益分立与多元。因此，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采用的是渐进的方式，在客观上它大大地降低了由社会震荡而造成的社会失范状况，但是，利益的调整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毕竟直接涉及社会成员的生存状况，必然引起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心理等层面的种种冲突。所以，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各种社会冲突不断展开的过程。同时，竞争的发展与加剧，也导致了人们的社会地位的普遍不安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分立化和相互排斥，并引发各种利益的冲突，由各种不适包括由心理不适而引发的种种矛盾也会在较大范围内不断地涌现。另外，政府的权威也在发展中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固然与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尖锐而产生的对于政府的行政能力以及社会调控和整合能力的考验有关，但更为深刻和根本的挑战，是来自于对政府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的挑战，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解释力的挑战。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基本理论看来，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是消灭了商品

和竞争的。因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意味着确认货币这一“世俗的上帝”的地位，也意味着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的关系的颠倒；竞争则意味着社会尚在延续动物界的生存竞争习性，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立甚至对抗。两者都是导致社会异化的原因，因而都与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特别是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政治理想大相径庭。因此，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中，商品经济和与之相联系的竞争都属于被扬弃的对象。恩格斯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个体生存斗争也将停止，只有到了这时候，“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摆脱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①

确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上述理论具有与当代中国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不相协调的性质。对于这种不协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代表邓小平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反对教条主义并举的政治宣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实现扩大原有意识形态解释力的一种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政治行动纲领。然而，有一些人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发现了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社会主义所作的界说不同的内容，因而断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失去其合理性；域外的一些政治势力则认为中国是在以渐进的方式倒向资本主义；等等。正当中国思想界处于多元纷争的时候，域外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潮以其强劲的势头介入了中国的意识形态争论，成为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选择和国民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心态的一种并不微弱的声音。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酿就了许多带有政治征兆的现象，如社会普遍表现出对于“政治”的冷漠，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757页。

政官员行为的“实利主义”取向，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冷漠，自由主义的书刊销量持续上升，尤其是自由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许多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讨论问题的人的视野中逐渐模糊和混淆起来，表现出他们对于基本理论界限已经失去基本的判断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实实在在地表明，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开创的思想正在中国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随着改革向市场的逐步推进，竞争机制日益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市场的理性和非理性倾向的空前发作，使我们看到了与社会繁荣形成对比的另一面，这就是恶性竞争导致产品过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自然环境持续恶化；金钱或者叫货币实实在在地充当了“世俗的上帝”，社会上“实利主义”大行其道；有些人为了金钱或者铤而走险，或者违背社会道德和责任，或者不顾自尊和人格；在利润的驱动下，商人们不惜重金地借助各种媒体，采用种种或者体面的或者粗俗的或者赤裸裸的包装，不断地唤起人们最原始的本能，激发种种甚至是病态的消费，商业上的坑蒙拐骗也大行其道。一些向来自我标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的媒体也在“实利主义”取向的驱使下，炮制种种粗俗的文字，制造无聊时尚，炒作“名人”隐私，渲染色情凶杀，以煽动人的窥私欲望和原始野性，有的甚至不顾道德与责任，为造假贩假大开绿灯，甚至本身就在为获得实利而不断地造假和贩假；社会上许多早已被弃除的丑陋现象如卖淫、嫖娼、贩卖人口等等死灰复燃。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也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工具化”，社会通过设立“人才交流中心”和“人才市场”的形式，把“人才”放置于“市场”进行流通，完成了把人变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的“物化”过程；社会在人们庆幸“人才有价”的欢呼声中，不知不觉地把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把“医

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货币所有者出钱招雇来的雇佣劳动者；令人心酸和同情的“打工妹”、“打工仔”受到非人对待的现象也在许多经济先发地带不时发生；与这些现象的大规模出现相伴而来的是人们精神的空虚、冷漠、粗糙化乃至野蛮化，一些令人发指的反社会甚至反人类的行为也不断地出现在那些自称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经济先发地带；社会治安长期持续恶化；等等。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发出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实际上就是对于人的“非人化”过程的一种反抗。大量的事实表明，马克思早年所憎恶和批判的许多社会现象，正在借助市场经济的推进，借助竞争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得到大规模的复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社会正在无情地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

显然，在当今中国的条件下，必须借助市场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教条主义般地套用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观点，不仅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是有害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的后果就证明了这一点。从思想史上的公民地位方面来看，马克思是一位批判市场经济的大师，但是，他的批判并非简单的非历史的道德批判，而是依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作出的批判。他认为，商品经济是人类实现扩大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其产生和发展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即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发生物的关系对于人的统治等异化现象，也是历史进步过程的实现形式。因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他认为有“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于自己

的支配下。”^① 这表明，马克思是反对仅从道德的要求出发，不顾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过早地、人为地取消商品经济的发展的。从这一方面看，中国依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选择走向市场经济，这在理论上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相一致的。但是，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重要的根据在于他立足于人类的解放，举起了批判市场的旗帜。他批判市场崇拜，揭露市场之所不能，分析市场的发展所导致的货币崇拜、经济暴政、实利主义、社会异化以及人被物化、工具化、非人化等等。对于这些现象的分析应该说是切中市场经济发展的弊端的，它不仅为西方执持正义追求的思想家所认同，也为中国向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这也就是我们认为中国社会正在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的重要根据。应该承认，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它既苦于市场经济的不发展，又苦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它既需要借助市场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又需要拥有消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的手段。也正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对于市场作出历史性分析和批判的马克思的思想的研究。相反地，我们需要通过认真、具体而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来确立起对于中国何以需要走向市场的理性认识，并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消除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极现象和指导我们的社会向着和谐健康方向发展的价值原则。这也是我们提出重读马克思的另一方面的根据。

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的思想一直都为寻求历史之谜的解答的人们所关注，其价值也一直在被人们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自从马克思的思想提出 150 多年以来，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并非历史的幸运儿，他的许多预言曾被历史的发展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2 版，第 108 页。

否定，他所期盼的许多历史事件也没有在他在世时得以发生。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作为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思想家的地位。在本世纪 30 年代初期，由于马克思一部被出版者命名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著作的出版，在西方世界骤然刮起了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旋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 50 年代后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持续不衰，西方有所谓“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的说法。“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都曾在西方社会的学术研究的天地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苏东剧变”后，当以“胜利者”自居的西方意识形态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时候，各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大型国际性研讨活动和纪念活动先后在西方世界颇有声势地举行。1995 年在巴黎举行了有近千人出席的“国际马克思大会”。法国的媒体以“马克思引起轰动”，“马克思没有死”等为标题，对大会的盛况进行报道。法国《解放报》认为，“这次成功的大会使我们得以测试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它集结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公众，证明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生”。^① 1998 年 9 月，第二次“国际马克思大会”又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再次鲜明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强调马克思的思想在它所及的主要领域，即批判资本主义的领域，可以直接应用和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会议还决定 2001 年在巴黎召开第三次“国际马克思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在 1998 年围绕着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世界各主要国家都举办各种大型的纪念活动，形成一种被称为“回归马克思”的热潮，如法国的“马克思园地”协会举办了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学者参加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大型国际会议，美国有国际社会主义学者代表大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1995 年第 35 期，第 273~274 页。

会，俄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加拿大、古巴、阿根廷、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以及日本等国家，都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出版方面，1998年巴西新发行《共产党宣言》50万册，法国发行《共产党宣言》的普及版，以色列有《共产党宣言》的西伯来文新版发行；美国还有在中学生中举行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有奖征文活动；等等。在2000年来临之际，西方社会这种“回归马克思”的热潮又有新的重大象征意义的突出表现，这就是马克思接连被不同的西方重要媒体通过互联网评选为“千年思想家”。这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价值的热切反应。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时，都不仅充分肯定马克思的历史贡献，而且强调马克思的思想的当代价值。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认为，无论怎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历史的一部分，如果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挑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反应，就无法理解20世纪的科学、文化与政治。^①美国《每月评论》杂志编辑埃伦·克米辛斯·伍德在题为《回到马克思》的论文中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刻是回到马克思的最佳的、最合适时刻。即使马克思在世，现在也是他应该而且能够大有作为的时代，而绝不会拒绝这一历史时刻的要求。其原因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第一次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资本主义的普遍性不仅仅就其全球化的发展而言，也不仅仅是指当今世界的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最远的外围）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再运转，而且其规律——包括积累、利润最大化、竞争等——已经渗透到了几乎人类生活和自然本身的所有方面，其方式也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二三十年前所不能相比

^① 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期，第13页。